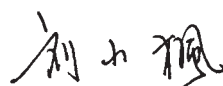


重評「文明衝突論」



1993年夏天，我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新成立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並參與《二十一世紀》編務，負責書評欄，必要時還得做評論員。

剛上任就接到一項評論任務：當年夏天，哈佛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在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 季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一文，展望冷戰之後的世界歷史走向，引發全球熱議。《二十一世紀》反應迅速，立即組織翻譯這篇文章在10月號刊出。

我在當年的評論文中寫道，既然亨廷頓在文章結尾時宣稱，西方國家有必要「維持必要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以保護在非西方文化國家的關係中的自身利益」，他又何以可能把國際政治衝突說成是「文明衝突」的體現①？

現在看來，必須理解馬漢 (Alfred T. Mahan) 才能理解亨廷頓。馬漢既是海軍軍官又是史學家，在他自己看來，其史學成就要遠大於軍事成就②。的確，馬漢的史著算得上美國文明意識成熟的歷史寫照，直到今天仍在養育美國的政治人③。

亨廷頓發表〈文明的衝突？〉後不久，有位美國的地緣政治學教授特別安排重印了馬漢在1900年出版的《亞洲問題及其對國際政治的影響》(*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以下簡稱《亞洲問題》)，並撰寫了長達六十多頁(按中譯本計算)的「引言」。他這樣提醒美國公眾：「馬漢曾預言，有一天中國會成為一個逐漸強大的勢力，對現存的國際體系提出挑戰——這種情況在寫下這些文字時也許正在發生。」④這個說法讓我們可以看到如今美國政治家的歷史心態：馬漢當時還在「深思熟慮」崛起中的美國如何擺脫「孤立主義」，以便對當時的既存「國際體系提出挑戰」，

他何以可能預言「有一天中國會成為一個逐漸強大的勢力，對現存的國際體系提出挑戰」？可以理解的是，作者所說的「現存的國際體系」，是指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世界新秩序」，而這個秩序的建立的確應該溯源到馬漢時代。

直到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才開始關注馬漢，他讓我們明白：原來，現代世界史是一部爭奪海上支配權的歷史^⑤。但我們若把馬漢僅僅看作現代海戰史家、軍事戰略家乃至地緣政治學家，都過於看輕他了^⑥。按照亨廷頓的評價，馬漢的著述帶有



「政治、意識形態甚至種族的弦外之音」，屬於「歷史哲學而非戰爭哲學」；他甚至「基於道德和宗教的理由」勸美國人相信，戰爭是上帝指導下的「人類進步過程的工具」，因而其視角「遠遠超出克勞塞維茨、約米尼以及其他軍事著作家」^⑦。

這樣的評價已經夠高了，但恐怕還沒有到位。毋寧說，馬漢是歐洲現代文明的自覺擔綱者，而且是作為一個美國政治人具有這樣的文明承擔意識：在他身上，歐洲文明的歷史命脈開始向太平洋東岸轉移。

馬漢的成名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和《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成於1890年代初期，人們通常將兩書與馬漢在十多年後發表的《海權的影響與1812年戰爭的關係》(*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合稱為「海權論三部曲」。這種看法雖然流行，而且幾成定論，卻不幸是錯的。與前兩部大著構成「海權論三部曲」的是1897年出版的文集《美國的海權利益：現在與未來》(*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海權對歷史的影響》記敘了從十七世紀中葉到英屬美洲殖民地「獨立戰爭」結束的國際海戰史，《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描述了馬漢心目中的現代世界歷史第二階段（拿破崙戰爭階段）的國際海戰史（《海權的影響與1812年戰爭的關係》屬於這一階段），《美國的海權利益》緊隨其後出版^⑧。這部文集由八篇文章構成，第一篇文章題為〈美國向外看〉（“The United States Looking Outward”），明顯針對美國立國以來形成的「孤立主義」國家意識。



直到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才開始關注馬漢。(資料圖片)

〈美國向外看〉一文原刊於1890年12月號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這提醒我們應該想到，馬漢寫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並不是出於純粹的軍事史學興趣，而是出於現實政治目的，即呼應「南北戰爭」之後美國文明意識的覺醒——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其著作記錄的「不是我的發展，而是這個國家從1890年到1897年的覺醒過程」^⑩。

《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的「緒論」和第一章能夠充分證明這一點，兩者共同展示了馬漢心目中的世界史輪廓(羅馬帝國—大英帝國—美利堅帝國)。這兩個部分與其說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的導論，不如說是「海權論三部曲」或馬漢的「海上強國論」的導論——更恰切的稱呼是馬漢的世界史導論^⑪。

《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的「緒論」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科學進步」給海上武裝力量帶來的巨大變革談起，以十八世紀末期的三場海戰為例，證明技術進步對海上軍事衝突的戰略和戰術產生了怎樣的實際影響。但若我們僅僅看到這一層，恐怕就讀得太淺表了。通過十八世紀末期的三場海戰，馬漢實際上展示的是十七世紀以來歐洲的大國更迭，只不過他想要證明，海軍實力在大國更迭的博弈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和《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兩書中，馬漢眼中的「世界性歷史時刻」得到充分展開，而在《美國的海權利益》的第一篇文章〈美國向外看〉中，我們看到，馬漢說「美國已經從夢中醒來」^⑫，「海權論三部曲」的世界歷史邏輯就這樣貫通了。

「海權論三部曲」世界史的第三部並非僅僅是《美國的海權利益》。美國在美西戰爭中輕而易舉地戰勝西班牙後，馬漢又不失時機地出版了《亞洲問題》，這年(1900)的歷史時間剛好跨入二十世紀^⑬。這時，美國不僅已經奪取西班牙在西太平洋與印度洋連接處的殖民地菲律賓群島，還宣布了針對歐洲大國要求中國「門戶開放」的申明^⑭。所謂「門戶開放」的實際含義是，支配中國這個「大市場」的權力必須對美國「開放」，現有大國不可把美國排除在外。

與馬漢在1890年提出「美國向外看」的呼籲聯繫起來看，我們需要意識到，馬漢的成名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雖然記敘的是發生在歐洲的海戰史，他心裏屬意的其實是太平洋西岸。

馬漢在《亞洲問題》開篇就顯得頗為興奮，他說，「最近，美國的擴張向前邁出了堅定的一大步」。但他又隨即警告，「美國擴張的倡導者也沒有預見到向太平洋以外擴張的空間，他們的視野沒有超越夏威夷」，這仍然是一種「防禦的視角」^⑭。言下之意，美國政治人的視角應該從防禦轉換為進攻。

所謂最近「美國的擴張向前邁出了堅定的一大步」，顯然指美國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菲律賓群島。儘管馬漢在美西戰爭初期並沒有像當時的諸多「帝國主義份子」那樣，把「吞併整個菲律賓群島」同與西班牙在美洲的衝突聯繫起來，但美國奪取菲律賓後，他仍然非常欣喜。他告訴美國公眾，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僅僅禁止美國干涉歐洲大陸事務，「當然不適用於美國對菲律賓和中國的入侵」。到了1902年2月，馬漢甚至認為，奪取菲律賓很有必要，這「給美國提供了進入中國的跳板」^⑮。

也許正是多虧馬漢的教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就制訂了一項作戰計劃：「直接從夏威夷到菲律賓，接着去攻佔中國大陸，之後再去攻佔日本。」^⑯

馬漢並不是在美西戰爭之後才提出「亞洲問題」。《美國的海權利益》中有一篇文章題為〈展望二十世紀〉(“A Twentieth-century Outlook”)，原刊於《哈潑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1897年9月號。在整個文集中，這篇最有看頭，其中所展示的對世界文明衝突的看法，即便在今天來看也頗具前瞻性。

馬漢賴以「展望二十世紀」的歷史地平線仍然是：憑靠工業革命帶來的「機械工藝的改進和交通運輸的大量增長」，歐洲國家以及美國獲得了強勁的「外向勢頭」(out impulse)，整個世界的政治面貌正在發生徹底改變。東西方文明在過去「一直相互分離，各自形成自己獨立的世界」，如今則因現代海軍的出現而不再相互隔絕，反倒「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接近」^⑰。基於這樣的認識，馬漢鄭重提醒美國的公眾：「我們正站在一個時代的開端；在這個時代，那個或許已被長期拖延的問題將決定性地得到解決：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將主導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⑱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不是一個歐洲人站在歐洲大陸的政治地緣位置上這樣說，而是一個歐洲裔殖民者站在太平洋東岸的美洲陸地上這樣說，並且是代表整個基督教歐洲文明說這句話。

馬漢在這裏所說的「東方文明」不是希羅多德 (Herodotus) 眼中的「東方」，而是希羅多德並不認識的東亞。在馬漢看來，即將到來的二十世紀最值得注意的世界未來前景是：相互隔離一千五百多年的東亞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將在誰「主導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的問題上一決雌雄：「當前，擺在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偉大任務、偉大使命是，將包圍着自己的眾多古老而不同的文明——首先是中國、印度和日本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並融進自身的理想，完不成使命就得毀滅。」^⑲

我們會對這段話感到驚訝：馬漢居然說古老的東方文明「包圍着」(surrounded)「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civilized Christianity)，而且「佔據數量優勢」(outnumbered)。難道中國人、印度人或日本人沒有理由說自己被「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包圍？何況，中國、印度和日本文明雖然相互之間有種種歷史的關係，還不至於就是一個整體。馬漢把東亞的「東方文明」視為一個整體，可見他自覺承擔歐洲文明命運的歷史使命感何其強烈。這足以提醒我們，不能僅僅從軍事學的意義上來看待馬漢的「海權(擴張)論」，毋寧說，我們更應該在心裏反覆掂量他所說的「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所面臨的「偉大任務、偉大使命」。

馬漢緊接着就說，眼下的世界並不完美，歐洲人不能指望「用理想中的完美手段」把東方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並融進自身的理想」，必須借助「強力」(force)為自己贏得時間，並持續「保持強權」(staying power)。畢竟，這個世界還「沒有共同標準」，各文明之間的平衡只能靠強權來維持。強權雖然「粗魯、不完美但並非可鄙的仲裁者」，而且在世界歷史上屢試不爽。馬漢隨即告訴美國公眾：世界歷史上的羅馬帝國是最為彰明較著的史例^②。一旦把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差不多一百年前的〈展望二十世紀〉對照起來看，我們便不難發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可說是馬漢的那個「被長期拖延的問題」的升級版。1996年，亨廷頓將文章擴展成了專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其中的第二章題為「歷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亨廷頓旁徵博引，展現了西方各色學人對文明的看法，偏偏沒提馬漢。難道是疏忽？恐怕未必。馬漢的說法有過於明顯的「美國擴張論」色彩，在後殖民時代，亨廷頓不便提到馬漢，但也不需要提到。畢竟，馬漢的美國夢已經實現。

2012年，長期擔任美國國防部特別顧問的國際政治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提出了「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隨即名噪一時，引發廣泛關注，很快於2017年擴展成專書《注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③。其實，亨廷頓在1996年已經明確提出了中美之間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只不過在當時，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經歷轉型期，前途未卜，很少有人會注意到他的預斷。即便注意到了，多半也會覺得他是在危言聳聽。亨廷頓說^④：

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臘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強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同樣，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興起和衰落的國家之間的「霸權戰爭」史。……在西方與中國之間缺少這種親緣關係的權力轉移中，武裝衝突並非一定會發生，但可能性會較大。伊斯蘭的推動力，是造成許多相對較小的斷層線戰爭的原因；中國的崛起則是核心國家大規模文明間戰爭的潛在根源。

亨廷頓早就知道，馬漢「借助於基督教信條、社會達爾文主義、功利主義和民族主義」，「詳細闡述了美國的昭昭天命這一民間信條」²³。我們是不是應該說，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同樣帶有這些「主義」，同樣「詳細闡述了美國的昭昭天命」？

註釋

- ① 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著，余國良譯：〈文明的衝突？〉、劉小楓：〈利益重於文化〉，《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10月號，頁5-21、26。
- ②③④ 參見西格 (Robert Seager) 著，劉學成譯：《馬漢》(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8)，頁428；441；380-82。
- ⑤ 參見 Jon T. Sumida, *Inventing Grand Strategy and Teaching Command: The Classic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 Reconsidere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⑥ 塞姆帕 (Francis P. Sempa)：〈學報版引言〉，載馬漢 (Alfred T. Mahan) 著，范祥濤譯：《亞洲問題及其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頁59。
- ⑦ 參見胡波：《後馬漢時代的中國海權》(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
- ⑧ 鈕先鍾：〈馬漢：著作與思想〉，載《戰略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175-87。
- ⑨ 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著，李晟譯：《軍人與國家：軍政關係的理論與政治》(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頁245-46。
- ⑩ 中譯本參見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頁296-434，「美國的利益」部分。以下譯文據 Alfred T.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Boston, M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7、1917年版有改動。
- ⑪ 轉引自亨廷頓：《軍人與國家》，頁247。
- ⑫ 馬漢著，李少彥等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年》(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
- ⑬⑭⑮⑯⑰ 參見馬漢：《海權論》，頁298；416、419；425；425；426。
- ⑱⑲ 中譯本亦見馬漢著，徐朵、李璟譯：《亞洲問題》，收入《海權對歷史的影響》，頁451-549；458-59。
- ⑳ 〈前言〉，載肯尼迪 (Paul Kennedy) 著，何衛寧譯：《二戰解密：盟軍如何扭轉戰局並贏得勝利》(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頁8。
- ㉑ 中譯本參見艾利森 (Graham T. Allison) 著，陳定定、傅強譯：《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㉒ 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頁230。
- ㉓ 亨廷頓：《軍人與國家》，頁247。另可參見 Suzanne Geissler, *God and Sea Power: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Alfred Thayer Mahan*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5)。